

关于国民党当局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龚和平

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是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逐步放弃了实行多年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走上“对内和平统一”,“对外抗日御侮”的道路,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如何评价国民党当局的这一转变,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此,本文略谈几点看法。

1935年华北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深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处于越来越紧张的对抗状态,中日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化。这时,“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①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当局的内外政策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国民党当局的这个转变,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紧密相连。

第一,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包括国民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的拥护和赞赏,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从而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的推行。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多年来力主团结抗日的基础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企图吞并全中国的危急局势,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红军不仅立即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同时还号召由各爱国党派、团体共同协商,成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成抗日联军及其总司令部,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起点,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一政治主张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36年,中国共产党又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政策,同时主动寻求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对话,以谋求在“一致抗日”的旗帜下“政治解决”国内问题。直至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仍然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对日抗战的实现而积极进行调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所有这些行动,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重,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抛弃前嫌的崇高风尚。

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全国各阶层人民予以积极的响应。

北平学生首先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他们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遂于1935年12月9日奋起举行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随后,这一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学生的伟大爱国行动,打破了国民党的腐败和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屈辱的黑暗局面,使九州大地显现出新的革命曙光,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和鼓舞。

在伟大的抗日救亡洪流中，全国许多爱国团体、民主人士也四处奔走呼号，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抗日救亡，共赴国难。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对时局的紧急通电中呼吁：“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举全国之力，以与敌人一战”，“以挽救国家危亡，有违背此旨，发动内战者，则本会愿与全国民众共弃之。”^②与此同时，一批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和军队高级将领，“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极为不满，毅然与共产党勾通联系，共同抗日，如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积极主张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合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实现国内和平，实行对日抗战。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也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并希望率领所部赴前线抗战，直到采取“兵谏”的方式发动“西安事变”。

上述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推动的结果。它使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更加孤立，同时也形成对国民党当局的巨大压力，迫使国民党当局不能不开始考虑改变其对内对外政策。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略，严重危及英美帝国主义在华权益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

华北事变之前，英美帝国主义认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企图是作为北攻苏联的准备。华北事变之后，日本的刀锋因苏联的严密防范没有能够指向北方，而是南下要灭亡整个中国，这就使日本和英美的矛盾日益尖锐。1935年后，日本在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口号下，大举向华北进行新的扩张。他们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以天津为中心，在铁路、矿山开采、航空、工业投资、商业和贸易方面全面展开活动。据统计，日本在华北的投资总额达1.4亿日元^③，这样，英美在华北的经济利益处处受到日本的排挤和打击。因此，英美帝国主义逐渐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不断责骂日本是“国际上的强盗”是“黩武的国家”，并且表示他们“正密切地注视着该地区内发生的事情”。同时，为了保住他们在华北的利益，也不断加强其扩张活动。英美与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反映在国民党内，就促进了亲英美派与亲日派的斗争，影响着国民党当局的对日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也严重危及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从1933年尤其是1935年以来，中日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华北问题上，取消冀东和内蒙古的傀儡政权，停止“分离”华北的策动，是国民党当局在华北问题上对日本的最低要求。日本在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中，不仅无意接受这两点，反而以咄咄逼人之势，威胁国民党当局承认其它一连串新的侵略要求。同时，日本在华北的武装走私与非法掠夺也日益猖獗，至使国民党政府主要财政收入中的关税、盐税、统税急剧减少。据统计，仅关税一项，从1935年8月至1936年5月，即减少3000万元，使国民党政府财政受到很大损失，严重动摇了它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是当亡国奴，当儿皇帝，成为民族罪人，还是起而抗日御侮，维护自己的统治，国民党当局不能不从根本上加以考虑。

总之，华北事变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推动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猛烈冲击，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也由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威胁已经临头，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已经波及到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及英美等国势力的切身利益。因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在十年内战的后期，出于迫不得已不得不开始改变其长期以来所执行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主张，实行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二

国民党当局开始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虽然是被迫的、不自觉的，但随着日寇侵略刀锋所向，他们也看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因此，在转变的全过程中，在准备抗日斗争问题上，不能不作出若干努力。

第一，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对内和平统一”、“对外抗日御侮”。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鉴于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逐步重新调整和改变对内对外政策。

1937年2月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今后的对内对外政策。全会虽然充满着激烈的斗争，但通过了《根绝赤祸案》。这个决议案一方面存在着污蔑中国共产党、诋毁中国革命的论调，另一方面却以曲折的语言承认了停止内战、容共抗日的政策。全会通过的“宣言”，在重申“对外则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后，宣布：“如果对日让步‘超过忍耐

之限度，而决然出于抗战”；“至于对内，则和平统一”，而“和平统一之目的，在集中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之力量，以排除当前之困难”^④。这一表示虽然还只是口头上的，但必竟是公开宣布准备抗战了，这是国民党当局从“剿共”内战到联共抗日的重要转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严重的时局面前，国民党当局在行动上也开始对日抗战。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积极调整军事部署，并且迅速派遣军队北上增援。在这个基础上，蒋介石又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事变必须以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条件，并表示：“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⑤。这个谈话是国民党当局由准备抗战到实行抗战的转变。

“八、一三事变”后，中日战争的扩大已无法避免，国民党当局的联共抗战态度更加强硬起来。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的命令，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又按照抗战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在7月15日向国民党提交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至此，国民党当局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现了“对内和平统一”，“对外抗日御侮”，完成了由“剿共”内战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最后转变。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⑥。

第二，加强国防建设和增强国防实力。

华北事变之后，鉴于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在武装力量、国防工程和军事后勤方面的建设。

国防建设的中心是军队的建设。国民党新军阀政权建立之后，虽然对其所辖军队进行了整编和若干训练，但其军事政治素质仍然十分低劣，正如陈诚所说：“以之内哄则有余，以之御侮则不足”^⑦。1936年秋，为适应国防需要，国民党当局决定采取逐步充实计划整编军队。一是编练新军，全国整编60个师，分5年完成；二是调整原有军队，淘汰老弱人员，并以3团至5团三级制师标准实行整编；三是组建装甲兵、机械化重炮兵、铁道兵、汽车兵、工兵、通讯兵等特种兵部队。这个计划到抗战爆发前约成其一半。整军后的步兵师，下设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一个野炮兵团，以及工兵、辐重、卫生、特务等兵种，总计人数为13800多人，马3500多匹，配备各类大炮近90门，中央军还配备了坦克、新式大炮等重型武器。连同未整理的部队合并计算，已有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20个独立团，共约170万人^⑧。同时，空军也整编为9个空军大队，全国设有262个飞机场，拥有各种飞机600余架。此外，海军经过整编，也拥有舰艇11万吨。在军队进行整编的基础上，各部队还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军事训练，军队战斗力也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国防工程建设方面，从1935年开始，也进行了若干整备。“江南方面，具体化的是苏嘉国防线，……修筑了京沪路苏州至沪杭路嘉兴的联络铁路，在杭州湾的乍浦和长江下游的福山镇又建筑了两座要塞，在两者之间造成了非常坚固的堡垒——‘兴登堡防线’。常熟、苏州、吴江、嘉兴、平湖全包括在内。在陇海线以北，则有‘马奇诺防线’。从潼关起沿黄河南岸到考城，东行经过曹县、单县、沛县，沿运河至利国驿、台儿庄，穿过运河经邳县、郯城直至连云港尽海止，防御工事也极坚强”^⑨。此外，在全国其它一些区域，也分别营建了数量不等的若干国防工事。

在军事后勤建设方面，主要实行兵工生产按照抗战的需要进行转变。一是开始将兵工厂从沿海地区向内地陆续转移；二是加速武器生产，扩大军火制造规模。经过一些努力，到“七、七事变”前，已经将较大较重要的若干兵工厂迁至内地；同时，军工生产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已经能够制造德国1924式步枪，仿捷克式轻机枪，德国式重机枪，仿法国式迫击炮，以及其它各类炮弹。所有这些应战准备措施，尽管因为七七事变的爆发没有全部完成，但它仍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把准备对日作战作为国防军事的基本方向。

1936年初，国民党军事当局先后制定了《民国二十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作战计划》等文件。在这

些文件中，虽然把“剿共”仍旧作为一项基本任务，但对于抗战战略也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构想。国防作战计划指出：“应拒止敌人于沿海岸及平津以东与张家口以北地区，不得已时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顽强之抗战，随时转移攻势，相机歼灭之”。同时，计划还提出从北向南逐次分为五道抵抗线，以淮阴、徐州、归德、开封、新宁、郑州、洛阳一线为最后抵抗线，并“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此外，计划还确定在南京、西安、南昌、成都、许昌、延平等地设立总军需库，储备50个师可用3个月的粮弹。1937年初，国民党军事当局又制定了《民国二十六年国防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在上年度计划的基础上，对于中日之间的军事形势作了更为确切的分析和估量，其中特别明确提出了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消耗战”的方针，要求“于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⑩。计划还决定在全国设立山东、冀察、河南、晋绥、徐州、江浙、闽粤七个战区和陕甘宁青、湘鄂赣皖、川康、滇黔、广西五个警备区，分别置于第一线和总预备队的位置上。

从上述情况来看，国民党当局在抗战爆发前的两个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对从平时转到战时的有关问题都作出了相应的安排和部署，应该说，它不失为一个积极备战和规划全面抗战的军事战略方案。

第四、在外交上，明确采取了对日强硬对苏、美、英等国联合的立场。

华北事变之后，尤其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日之间的战争形势已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面对这种状况，国民党当局逐步改变了在外交上长期以来对日妥协的态度。1937年1月2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我国调整邦交，主在收复国权，故凡由于非法手段所造成之事实，务请贵国从速取消，同时对于足以引起未来纠纷之策动，今后务请严予避免。华北问题为调整工作之中心问题，满洲问题虽暂可缓谈，但华北现状亟须改善。此为我方最低限度之调整工作”，“我方最大忍耐，亦有相当限度，万一局势恶化，则由消极的抗日，进而为积极的斗争，恐亦将无法避免矣。”^⑪4月5日，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长王宠惠又发表谈话，公开抨击日本鼓吹的所谓“经济提携”，拒绝接受日本提出的屈辱条件。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积极改善和进一步密切与苏、美、英等国的关系。1937年3月20日，蒋介石派遣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秘书长翁文灏和海军部长陈绍宽等人赴欧美各国进行外交活动，探询各国政府的对日态度，并表明中国政府的抗日决心，并且还设法筹购军火，以备对日作战。此外，翁文灏奉蒋介石之命，还专程赶赴莫斯科会晤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双方商谈了各自关心的若干问题，进一步缓解和密切了中苏之间的关系，在对日政策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共同的想法。

总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近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民党当局在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过程中，顺应抗日救亡潮流，作出了若干符合民族利益的正确决策，实行和提出了一些较好的计划和构想。虽然这些决策和准备还很充分很不完善，但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以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国民党政策上的开始转变，以及蒋介石先生7月17日在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⑫。

三

国民党当局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虽然为全民族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这个转变同时也具有很明显的两面性和暂时性的特点。如同蒋介石当时所称，“编共而不容共，抗日而非排日”^⑬。这说明，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之后，阶级矛盾虽然降到次要地位，但并未完全化解。因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不是坚定不移的，而是动摇的。这种情况，无疑也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了很大的消极作用。

其一，国民党当局在对内政策方面虽然逐步进行调整，直至放弃“剿共”政策，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行“和平统一”，但是它仍然反对开放民主和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不愿意承认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平等的地位。为此，他们一方面对于自己背叛三民主义，取消人民民主权利，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造成国民经济衰弱，国防空虚，招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状况，不仅不引咎自责，而作改革准备，反而委过于“人民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另一方面，他们对待中国共产党抛弃前嫌，

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识大局行为总是投以不信任或敌视的眼光。他们以“根绝赤祸”，拖延抗战为方针，“就是要把共产党的活动消灭，根绝，就是在准备抗战的借口下把抗战拖下去”^⑭。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国民党当局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是“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授命之说。”国民党当局这种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攻击诬蔑的行为，充分暴露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基本立场没有什么变化。由此可见，“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⑮。国民党当局的这种态度不能不成为国共两党关系和全民族团结抗战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国民党当局仍然不愿以平等地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致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两党只能维持遇事协商，临时约见的方法解决问题，这实质上就是企图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里面去，加以溶化。所有这些，说明国民党当局在实行对内政策转变的同时，仍然存在着溶共的图谋。当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后，这种溶共政策就很自然地向着限共反共的方面滑行，给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其二，国民党当局虽然在对外政策方面作出了“抗日御侮”的表示，并在实际行动中进行了若干努力，但是，国民党对外政策本身也同时包含着对日谋和和妥协的危机。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不可能打到收复东北这个“底”，另一方面又不可能同意以过多地丧失主权来谋取和平。然而，根据中日之间从局部战争到全面战争发展的实际情况，国民党当局没有可能以保持领土主权完整来期待日本停战。于是，他们认定在一定程度上执行“战而后和”将是最有利的结局。因此，他们在准备和实行抗战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放弃与日本谋和和妥协的企图。华北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上就公然宣称：“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苟国际演变不断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可为最大之忍耐”。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仍然表示：“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希望以外交方式，求得芦事的解决”。即使在“八·一三事变”之后，国民党当局实现了走向抗战的最后转变之时，仍然存在着谋和妥协的意向。1937年10月下旬，正在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国民党当局接受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居间“调停”，企图以谋和和妥协的办法中止中日之间的战争。如何看待国民党当局的这一谋和行动？笔者认为，在战争爆发之后，为寻求尽早结束战争，弱者向强者谋求议和，其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不应该一概视为妥协投降。但是，关键在于谋求者的基本立足点和为谋和所付出的代价，如果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以丧失领土主权来换取所谓的和平，应该说是一种严重的妥协投降行为。从国民党当局谋和的实际情况来看，直至1937年年底，仍然标榜同日本谈判的目标是恢复芦沟桥事变爆发前的状态，而对东北失地完全不顾，对华北主权问题，也不甚明确。由此可见，国民党当局的这一图谋活动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妥协投降行为。此外，国民党当权者与亲日派的投降活动也有一定的联系。“蒋介石还每月从军事秘密费中拨给高宗武（汪精卫集团成员，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编者）活动费6000元”^⑯，在香港，上海等地与日本政府建立联系，进行谋和妥协活动。

由于国民党当局在对外政策中的两面性，因而使其抗日斗争带有很大的不彻底性和消极性，这种状况同样对全民族团结抗战带来了极大的消极作用。

其三，在军队和国防建设方面，国民党当局虽然进行了很多并有一定成效的工作，但国民党军队的性质和极端腐败的军事制度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军民对立、官兵对立的现象十分严重，甚至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许多国民党军队“各自成军，既领国饷，复敛民财，甚至奸淫抢掠，无所不为。”^⑰同时，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指挥系统不统一，导致统帅机关不能提掣全军。在国防工程建设方面，象苏嘉国防线这样重大的工程，虽然国民党当局花了近两年时间，动用了4个师的工兵团，采用当时先进的技术，全用钢筋水泥做成。然而，由于蒋介石崇拜希特勒德国的国防工程建设，因此整个工程建设全部由德国工程师参与设计和监造。由于德国和日本的特殊关系，在上海战事爆发时，工程的设计图纸和钥匙却不翼而飞至日本大本营，为日军的进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条件。此外由于上海战事失利后，国民党军事当局指挥失误，没有在该线设留守部队和响导人员，也没有给后撤部队工事位置图，造成部队找不到工事位置，找到工事位置的又没有打开工事的钥匙，以致在日军跟踪追击之下，没有办法占领工事。苏嘉国防线就这样放弃了，完全没有起到阻止和打击日寇的作用。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其它战区也时有发生。很明显，国防工程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国民党正面战场连连失利的重要原因，它对整个抗日战争的不良影响也是很大的。

其四，在军事战略方面，国民党当局虽然随着内外政策的转变而制定和提出了一些比较好的对日作战计划和战略构想，但其本身也存在着不少严重的不切实际之处和明显的错误。

首先，在抗战地域的选择上，根据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企图，华北战场应是战略全局和战争的中心所在。然而，根据国民党军事当局制定的《民国二十五年作战计划》和《民国二十六年国防作战计划》以及1937年8月南京国防会议制定的作战指导原则来看，却存在严重的判断和决策错误。在《民国二十五年作战计划》中，就有集重兵于东南沿海的打算，当时国民党军事当局认定：日本“陆军主力便于由东北向西南进展，更仗其海空军之优势，随时可能于青岛、连云港、长江、杭州湾、福州、厦门等处掩护其陆军之一部任意登陆”，因此，我“国防军事一切建设准备，当以日本为对象而筹划之”^⑧。到1937年8月初召开的南京国防会议上，这一战略构想发展成为作战指导原则，即“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上海要地，巩固首都”。这个决策从政治上考虑较多，从军事上并非上策，它一方面导致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役中伤亡过大，另一方面又促成日军在华北得以顺利进攻，最后终于造成中国军队在南北战场两相失利的惨败局面。这些作战计划，特别是上海作战计划，是蒋介石亲自参与制定的，它虽然对整个抗日战争是必要的，但也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质，这主要是因为上海地区是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中心，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必然要拼死相争。同时，它也体现了国民党当权者亲英美的心理和指望英美等国干涉的幻想，正如李宗仁所指出：“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士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火拼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⑨。除此以外，它与《民国二十六年国防作战计划》中提出的“持久战”和“消耗战”的方针也是自相矛盾的。

其次，在作战方针上，国民党军事当局在兵力、武器完全不如日军的情况下，企图依靠单纯的阵地防守来抵抗日寇的进攻。在《民国二十五年作战计划》和《民国二十六年国防作战计划》中，就将北向南逐次分为五道抵抗线，企图实行阵地对阵地的节节抵抗。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采取的战略战术主要是纵深穿插，两翼迂回，攻占战略重点。因此，国民党军事当局的这些计划对狂妄的日寇是极不适当的。再加上国民党最高军事统帅部门在指挥作战时又没有很好地调整作战计划，其结果只能是处处设防，处处薄弱，最后不能不造成一溃千里的局面，给整个抗日战争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和极其严重的后果。

* * *

综上所述，国民党当局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一方面顺当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对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国家和民族作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由于这个转变是建立在不自觉和被迫的基础上，同时又具有很明显的两面性、暂时性和若干不切实际的特点，这就必然导致它不可能彻底改变坚持独裁统治，反共反人民和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民族利益的立场，不能不给全民族团结抗战造成严重的恶果。根据这种情况，单纯以是否愿意或参加抗日斗争为唯一标准来评价国民党当局的这一转变是片面的，作为国民党当局对国内阶级关系、国共两党关系和其它党派关系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样也是衡量转变的客观标准。客观地、全方位地评价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认识国民党当局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后来发生政策变化的必然性，才能明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注释：

①⑧⑩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9年版，第233、335、324页。

②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救国会》，第108页。

③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409页。

④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28—429页。

⑤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台湾出版，第583—585页。

⑦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⑧ 何应钦：《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351页。

（下转46页）

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他们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至于那要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于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又说：“费尔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管他自己多么不愿意或想不到是这样。”④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也完全适用于民主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民主社会主义鼓吹多元主义，鼓吹改良主义，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归结起来，就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国际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彻底揭穿民主社会主义的反科学性质，更加坚定地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

注释：

-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页。
-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147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本文责任编辑 杨小岩)

(上接88面)

- ⑨ 冯子超：《中国抗战史》第41页，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 ⑩ 参谋本部：《民国二十六年国防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战史会档案。
- ⑪ 朱汇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上册，第48—49页。
- ⑬ 《蒋介石日记》(1937年2月16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上册，第118页。
- ⑭⑮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3、194页。
- ⑯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的回忆纪实》，《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第64页。
- ⑰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3页。
- ⑱ 参谋本部：《民国二十五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民国二十五年国防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战史会档案。
- ⑲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700页。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